

# 沙博理翻译实践的“权力场域”视角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滕梅 王陆陆

**摘要:** 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中,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场域”概念,试图通过对沙博理翻译活动的案例研究,分析“权力场域”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沙博理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的翻译家,长期从事对外翻译工作,其翻译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权力场域”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本文以沙博理的翻译活动为个案,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重点分析“权力场域”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翻译选材、译者社会经济地位、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

**关键词:** 翻译社会学;沙博理;场域;权力场域

**作者简介:** 滕梅,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电子信箱: tmei@ouc.edu.cn  
王陆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电子信箱: 1589660185@qq.com

## 1 引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学者们开始将翻译放置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思考,这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逐渐被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其中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影响最大,是“目前参考社会学框架进行的翻译研究中,被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王悦晨,2011: 5),其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分别为“场域”“惯习”和“资本”。

布迪厄对“场域”概念的描述是:“场域”指的是“拥有自己独立运行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以文学和艺术场域为例,布迪厄认为,“作家的存在和文学场域的相对独立性密不可分”,因为该场域内“有着明确的作品评价原则”(同上,1993: 162-163),即:场域相对独立,拥有自己的运行法则。

“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一种力量关系的空间,参与各方都在其

他场域拥有足够资本,占据支配性位置(dominant position)”(同上,1996:215),“权力场域”相对于其他场域而言,通常处于支配性位置,以文学和艺术场域为例,布迪厄认为,尽管文学和艺术场域拥有相对独立性,但其在“权力场域”中仍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dominated position)”,“不论某个场域的独立性如何,始终受到‘权力场域’的影响,受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影响”(同上,1993:38-39)。由此可见,“权力场域”的参与者为“不同权力的持有者”(同上,1996:215),下文将会提到的“赞助人”也属于这一范畴。“权力场域”的参与者在其他领域占据“支配性位置”,并影响其他领域的活动。

翻译活动和文学与艺术息息相关,译者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权力场域”的影响同样作用于翻译活动。

沙博理(Sidney Shapiro)是著名翻译家、作家、中国问题学者,他具有犹太血统,在美国长大、接受教育,二战期间与中文结缘,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三十二岁的沙博理出于对中文的热爱,只身前往中国。1951年沙博理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1954年后在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社任职,以外国专家的身份担任翻译和编辑,从事汉英翻译工作长达50年,翻译成果丰硕,翻译了巴金、茅盾、李有才、孙犁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等,总字数约1000万。沙博理于2009年被授予“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的翻译代表作《水浒传》全译本获得中国文联最高翻译奖,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和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沙博理曾长期在中国外文局从事翻译工作,这使其译者身份呈现出典型的“制度化”特点(任东升、高玉霞,2015),在特定时期受到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权力场域”对翻译活动的决定性影响。过去对沙博理翻译的研究多集中于微观角度,侧重探讨沙博理的翻译方法、翻译思想等,鲜有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考察其所受聘于的国家机构对其翻译活动的规约,探讨“权力场域”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本文尝试以“权力场域”为出发点,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沙博理的翻译活动,视野更加宏观,同时,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之时,研究沙博理这位助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希望能够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 2 “权力场域”影响翻译选材

沙博理曾先后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和外文出版社工作,是《中国文学》杂

志的主要译者之一，因此他的翻译作品选择基本是通过《中国文学》的整套翻译流程确定的。《中国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向国外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官方刊物，对中国文化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由中国文学杂志社、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社出版，分为英、法两个版本，共出版590期，译介文学作品3000多篇，介绍古今作家和艺术家2000多人次，发行到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郑晔，2012：7）沙博理作为该杂志的主要译者之一，与其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国文学》这一阵地上，沙博理成绩斐然，翻译著作包括《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林海雪原》等二十多部文学作品。因此，《中国文学》杂志成为研究沙博理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入口。

当时《中国文学》的翻译流程主要分为4个步骤：1）征求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中文编辑部的学者进行翻译选材，之后交由主要负责人商量并经作协有关领导参与讨论然后确定；2）中国译者或者外籍译者进行翻译；3）中国编辑学者审稿、校对；4）主编主要负责编排、定稿（王晓燕，2013）。从上述翻译流程可见，选材的决定权不在译者，而是由中文编辑部的学者进行选材，然后再交由作家协会的有关领导最终确定，实质上就是由国家机构决定的。因此，“权力场域”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能够在翻译选材方面得到体现。

沙博理主要翻译的是“当代作品，尤其是那些战争题材的、战斗的”（沙博理，2006），他“对《中国文学》的选材也会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并没有任何权利去改变选稿范围”（郑晔，2012）。当时，《中国文学》的主要译者还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杨宪益曾在其自传中表示，他们“常常要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方能达成协议”（杨宪益，2001：190）。

“权力场域”影响下的作品选择不以译者喜好为标准，而重在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因此在沙博理当时的翻译活动中，翻译选材的每个环节都会受到“权力场域”的影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机构与译者的个人选择并不一定总是会有冲突，例如，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林海雪原》等文学作品体现出中华儿女的英勇和气魄，沙博理曾在其自传中写道：“我很喜欢翻译它们，对其中的许多人物感到亲切。不论是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还是在公社的田地里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国的男女英雄都有那么一股勇气和闯劲，强烈地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沙博理，2006：97）。在这种时候，国家的选择与译者的个人选择非常一致，达到了“双赢”。

### 3 “权力场域”影响译者社会经济地位

“权力场域”通过“赞助人”影响译者社会经济地位。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改写(rewriting)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翻译不可能真实再现原文,因为翻译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赞助人”是一个权力实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构。“赞助人”意味着“译者必须在他们的赞助人所塑造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愿意并能够证明赞助人的地位和权利确实如同验证过的那样强劲有力。”(Lefevere, 2004: 17-18)

赞助人可以对翻译活动起到制约作用。沙博理是《中国文学》的译者之一,因此沙博理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即《中国文学》杂志的赞助人。《中国文学》杂志的上级领导都属于“负责外宣的国家机构,也就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赞助人,由他们向国家财政部门申请《中国文学》的运营经费。”(郑晔, 2012: 27)。

同时,赞助人还能对译者社会经济地位起到不可估量的保障作用。在担任《中国文学》的译者时,沙博理享受的是外国专家的待遇,待遇优厚,“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译者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外国专家的工资比普通翻译的工资多好几倍,甚至十倍。”(郑晔, 2012: 56),沙博理虽然于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然而外文局仍然保留了其外国专家的待遇。“每月工资440元,继续享受每年的公费旅行,一个月的带薪假期,免费赠送的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还被邀请出席国宴,国庆节在观礼台上有他的位置。”(沙博理, 2006: 179)这是其专心从事翻译事业、翻译成果显著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保障,沙博理才能专心从事翻译事业,著作颇多,成绩斐然,先后获得“彩虹翻译奖”“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也由此不断增长。从当时赞助人对沙博理的制约和保障中,也体现出“权力场域”对沙博理翻译活动的影响。

### 4 “权力场域”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

“权力场域”通过翻译目的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在沙博理所从事翻译活动时期,陈毅曾经说的“要把我们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扩大我们的革命经验,加强对帝国主义的打击”(王晓燕, 2013),可见,沙博理翻译时期,翻译

的目的中带有明显的使命色彩，“权力场域”通过翻译目的影响到沙博理的策略选择。

#### 4.1 翻译策略受到当时特权阶级的制约

沙博理在2008年参加《鲁豫有约——一个美国人的半生中国情缘》<sup>①</sup>节目的时候曾表示，原来《水浒传》的译名是“Heroes of the Marsh”，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译名受到反对，因为“hero”这个单词传达出来的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意思。后来沙博理和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将“heroes”改为“outlaws”，反对者以为“outlaws”只能表示“土匪”的意思，于是不再追究。但其实“outlaws”在英文中的主要意思是“好汉”，这一新的译名“Outlaws of the Marsh”比原先更为传神，贴切，更能传达出“不受统治阶级束缚，代表群众、百姓的英雄人物”这一意味。

尽管沙博理通过自己的灵活处理和对两种语言的超强理解最终将《水浒传》的名称的神韵准确地传达出来了，但翻译过程的波折让我们看到特权阶层对沙博理翻译活动的决定性影响。

#### 4.2 灵活翻译，彰显英雄人物形象

沙博理在翻译《新儿女英雄传》时进行了一定的策略选择，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英雄人物形象，向西方传递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正面形象。沙博理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当时的国家翻译目的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原文：“老蔡，你不用动员我！我接受党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要想办法完成它，你放心吧！（袁静、孔厥，2005：153）

译文：“You don’t have to ‘rouse’ me, Blacky,” he growled. “I know how to accept a Party responsibility. If I die, it’ll be with honour.” (Shapiro, 1958: 178)

在例(1)中，译文“If I die, it’ll be with honour”属于译者沙博理增译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增强英雄人物的使命感，凸显英雄形象。

(2) 原文：一阵功夫，高屯儿背着一支三八大枪，别人有的带着钢盔，有的拿着子弹，嘻嘻哈哈地上来了。马胆小还站在水里，他年纪比旁人大，动

作最慢,手里拿着两只水淋淋的大皮靴,正在往外倒水呢。大水在堤上高声喝着:“马胆小,你胆子大起来啦?还不上来!”马胆小一面应着,一面把两只皮靴的带儿挽住,套在脖子上,又去扒汉奸的纺绸褂。那汉奸的脑瓜打烂了,白花花的脑浆漂在水面上。(袁静、孔厥,2005:47)

译文: Tun brought back a Japanese rifle. Another man carried a steel helmet; a third, a cartridge belt. They were grinning happily as they climbed over the embankment. Jumpy Ma was still in the stream, pouring water out of a high pair of leather Japanese boots. He was older and slower than the others.

“When did you get so brave, Jumpy?” called Ta-shui from the dyke. “Hurry up!” (Shapiro, 1958: 52—53)

在例(2)中,通过原文译文对比可以看出,原文“又去扒汉奸的纺绸褂”等细节刻画出当时的农民游击队十分真实的一面,但是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并不利于刻画出农民游击队勇敢正直的正面形象;同时,在语言层面上,“白花花的脑浆”等表达亦稍显野蛮血腥。因此,沙博理选择将“马胆小一面应着,一面把两只皮靴的带儿挽住,套在脖子上,又去扒汉奸的纺绸褂。那汉奸的脑瓜打烂了,白花花的脑浆漂在水面上”这一部分直接忽略不译,既不影响理解,又营造了农民游击队积极正面的形象。

从沙博理的灵活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翻译策略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权力场域”的影响,带有较明显的使命感,即传递正面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

## 5 结语

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以一种更宏观的视野来审视沙博理的翻译活动。从以上对沙博理翻译活动的个案分析可见,沙博理的翻译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深受其所在的国家机构的影响,深受“权力场域”的影响。“权力场域”可以影响翻译的选材,通过“赞助人”影响译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并通过翻译目的影响译者的策略选择。“权力场域”对翻译活动能起到积极作用,筛选出体现本国优秀文化的作品进行翻译,对译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保障作用,可以为译者专心从事翻译工作提供条件;同时,“权力场域”的影响也使得翻译活动能够更好地实现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

## 注释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西方翻译政策比较研究》(14BYY009)。

① 《鲁豫有约——一个美国人的半生中国情缘》

<http://global.pptv.com/show/WZGibPKQKerhp508/pid/21701.html>

##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World* (S. Emanuel,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vre A. 2004.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hapiro, S. 1958. *Daughters and Sons*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戴延年、陈日浓, 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一)》,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任东升、高玉霞, 2015, 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 《中国翻译》(1): 18—23。
- 沙博理, 2006, 《我的中国》(宋蜀碧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 王晓燕, 2013, 新中国(1949—1966)“红色”小说英译研究——以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海洋大学。
- 王悦晨, 2011,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 《中国翻译》(1): 5—13。
- 杨宪益, 2001, 《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袁静、孔厥, 2005, 《新儿女英雄传》,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郑晔, 2012,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博士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